

從幾件檔案看成大校慶

／王健文

「校慶」真的是學校的生日嗎？

不久前，台大歡慶八十校慶，校慶日是十一月十五日，這一天之所以成為台大校慶，只因為那是一九四五年民國政府教育接收委員接收臺北帝大的日期。台大八十，追溯的是一九二八年臺北帝大的成立。初生年若要合得上出生日，也許臺北帝大開放的四月三十日更應該成為台大的校慶日。事實上，台大校友，歷史系畢業的石文傑早在一九八四年即倡議台大校慶應回復到四月三十日。（參看：石文傑，〈台大有生年缺生日〉，《中國時報》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人間副刊」）

同樣是在十一月中旬，成大也剛過了創校七十七年校慶，眼看著再三年，將是「成大八十」的熱鬧時節，成大八十還是在十一月十一日慶祝嗎？還是可能更易為另一個日子呢？

七年前，我參與編纂了成大七十年的校史《世紀回眸》，在其中一篇〈前世今生：關於成功大學的歷史記憶〉中，我也寫下了這樣的呼籲：「在為學校七十歲慶生的當頭，也許有點尷尬，但似乎不可逃避的是：我們恐怕得在審慎考慮校慶的時日了。」

兩年前，為成大博物館策劃的「成功的美麗與哀愁：看得見與看不見的成大」特展，特別在校長室故址以「歲月悠長」、「以父之名」、「其泣嗶嗶」三個子題，串連起成大的「生平」，並在最終結處，再次提出這樣的呼籲。

七年過去了，兩年也過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成大人看過這篇文章？看過那次的特展，也不知道有多少成大人知道成大校慶的由來？成大大一直發願要超越台大，能夠早一

步超過台大，深刻反省校慶日的訂定，也許也是個機會。如果一再延宕，等台大正式更改校慶，成大才開始跟進，則不過是拾人牙慧、東施效顰罷了！

學校的前世與今生

先來看看一份一九六六年由臺灣省教育廳發文給北一女中的公文，轉達來自教育部的訓令，說是接獲各方反應云：

「報載最近臺北第一女中二十週年校慶，日本婦女組織團體來台參加，在台各界名流掀起熱烈歡迎運動。據熟識日本情形人士透露，戰後日本對據台時期所有各校畢業生均組織有同學會，經常集會聯誼，殆遍全國。查日本戰敗撤退至今已滿二十年，侵佔時期各學校均經改換校名，學校內容亦已煥然一新，是前者業已完全解體，後者乃係一種新校，前後兩校判若兩人，實不能稱為校友。而日本竟爾念念不忘，組織團體、拉攏關係，其動機不無令人可疑之處，應請有關當局注意其動態。」

因「前項反映頗具見地」，所以要求各級學校「密切注意至日方組團前來參加校慶等活動應予以限制。」

這件受文者是北一女中的公文之所以出現在成大文書組收藏的檔案中，是因教育廳通令各縣市政府，以副本抄送省立中等以上學校，因此當時的省立成功大學也收到了同樣的公文副本。

省立成功大學收到了公文副本，除了存檔備查之外，自然必須一體遵行。這份公文對一切一九四五年之前已經成立的省屬學校，明白要求必須清楚切割一九四五年前後的學校歷史，戰後由國民政府接收之學校，已「改換校名」、「煥然一新」，如同「一種新校」。而一九四五年之前的學校前身，「業已完全解體」，「前後兩校判若兩人」，日籍校友之說，實屬無稽。

被遺忘的十五年

一九七六年，為慶祝「三十」週年校慶，委由中文系的呂興昌先生編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紀要初編（一九四六—一九七六）》。倪超校長作序時如此發端：「本校歷史雖由日人於中華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創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開始，但彼時日人實施殖民地教育政策，其目標乃培植其南進侵略所需之人才。故學校全屬日人，而本省子弟能入此校讀書者不過百分之三。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翌年二月，改為臺灣省立工業專科學校，是年十月十五日，奉令升格為臺灣省立工學院，而教育政策及目標均依三民主義原則；全民教育機會均等，為國家培植有用人才。」而《校史紀要》本文的編年紀要中，僅在一九四六年的第一條記事，以短短百餘字，交代了戰前十五年的學校歷程。

更早，在一九七一年時，羅雲平校長即曾在一次行政會議中表示：「本校校史之創始，應從光復起計算。至日據時代之設校經過，可簡要敘述。並應特別指明，日人設校

之目的，在培育日人，助長侵略，與現在教育宗旨之不同。及當時限制本省同胞就學之實際情形。」

羅雲平、倪超兩位前後任校長的說法如出一轍，也接續著一九六六年那份副本公文中教育主管當局的訓令。戰前臺南高工時始就學機會的不平等，基本上是事實的陳述，只是，一個學校的歷史，是否因此就不能承認，也許在今天會有不同的角度。

又過了十年，夏漢民校長任內，由當時任秘書的李金振先生主編，出版了《成大四十年》。這本校史呈現了較活潑的風格，卻更直接地以一九四六年作為成大歷史的起點。〈簡史〉中追記學院原始：「隨著抗戰勝利，本省光復，許多原為日人所創設的學校紛紛改制。現位於臺南市大學路一號的國立成功大學原為日人所設之高等工業學校，亦於民國三十四年光復後改為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首任校長為王石安博士，時值八月。翌年十月本校升格為省立工學院。」

臺灣光復與學校新生

其實，早在一九五三年之前，臺灣省教育廳早就要求一切一九五三年之前成立的學校，一律以十月二十五日臺灣光復為共同校慶。因此，一九五三年一月，當時的省立工學院校長秦大鈞行文呈報教育廳，請求可以另訂校慶日，公文如下：

公文的主旨事由是「呈請核示可否以十月十五日為本院院慶日」，公文稿中寫著：

一、奉鈞廳一月十日……令……本省光復前創辦之各級學校應以十月二十五日為校慶紀念日，務遵照。

二、查本院於三十五年九月五日奉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核准由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昇格為省立工學院，同年十一月在奉前教育處……核准於三十五年十月十五日昇格。啟用關防及官章在案。

三、可否即於十月十五日本院昇格為工學院之日為本院院慶日。」

若依教育廳先前發布的命令，臺灣將有許多學校有著共同的校慶日：十月廿五日。這一天代表的是臺灣重回祖國懷抱，打個比方，是失散多年的兒女回到母親的懷抱，因此，不論兒女原來生長，一律以此日作為他們的生日，界以慶祝新生，並遺忘新生前那不堪回首的過去。

學校的歷史從「新的生命」算起，學校的生日自然也就是獲得「新生」的那一日，這是同一個邏輯的。而一個學校的生日如何訂定，必須經過上級行政主管機關核准，也可見得當年學校的自主性如何了。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之間，從省立工學院到省立成功大學，成大的校慶一直是十月十五日。那麼。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三年之間呢？是延續成大前身「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校慶嗎？

顯然，戰後第一任校長王石安並不認為如此。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五日，本校奉令昇格，改稱「臺灣省立工學院」，為了慶祝昇格以及各項修繕工程的完工，於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行了「工學院展」，各界來賓蒞校參觀盛況空前，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也蒞臨該慶典會場（現格致堂）致詞。在慶典中王石安校長當場宣佈，定十二月二十七日為校慶日。換言之，以象徵學校新生命的開始重要儀式慶典，作為學校的生日。

雙十一校慶的由來

十一月十一日又是怎麼來的呢？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成功大學校刊》120期中報導：

本校校慶原為十月十五日，係工專升格為工學院之日期，作為校慶日原無確切意義。由於十月份學期將開始，加以十月份慶典較多，故施行以來，諸多不便。經查本校校史，四十五學年度本校奉省令改制後，當時省府嚴主席曾於十一月十一日蒞校巡視，爰改以此日（十一月十一日）為本校校慶日，業經成奉臺灣省教育廳54、10、24教一字第六七二一四號令轉班教部臺54高字一五九八九號令，核准自本年起施行。

一九六五年的一份呈省教育廳的公文如此寫著：

「一、本校自四十五年奉令改制為大學後，沿用省立工學院時期之校慶日（十月十五日）為校慶日，非惟以無意義，且實施以來，全校師生頗多不便，茲將其原因摺舉大者臚陳於次：

- 正常學制查每年十月初旬尚在辦理註冊選課事宜，學生返校伊始，課業生活均未就緒，均感校慶日期匆迫，不及展開各項慶祝活動。
- 十月份各項慶典正多，校慶倘在十月舉行，對於學生課業，亦增加影響。
- 校務行政方面，十月分工作亦最繁冗，籌措校慶事宜亦多不便。
- 經查本校四十五學年度改制為大學時，省政府 嚴主席家淦曾於十一月十一日首次蒞校巡視校務，擬及以此日（十一月十一日）為本校校慶日。並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

真相大白，原來十一月十一日是嚴家淦在省主席任內「巡視」本校的日子。如果說升格為學院之日「無確切意義」，那麼，上級長官巡視的日子，又有什麼確切的意義呢？

以學校為主體的歷史記憶

有趣的是，剛編完《成大四十年》，不過四年，學校又開始規劃要編纂一部新的校史，計畫在第二年（一九九一年）出版，記錄學校「六十年」的歷史。後來以編年體形式的《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副題「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其中戰前十五年的部份，約佔全書近五分之一的篇幅。

換言之，在一九九〇年決定要重編校史之前，成大的歷史都是從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接收之後算起。自一九三一年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一九四四年短暫改制為臺灣總督府工業專門學校，乃至戰爭結束，一九四六年初，王石安校長接掌校務，學校改稱「臺灣省立臺南工業專科學校」之前的十五年，在一九九〇年以前的校史記憶中是不被承認的，即或提起，也只是草草幾行帶過，並加以「扭曲狹狹的殖民教育」、「為日本帝國主義南進侵略培植人才」等負面評價。

其實，學校的名稱往往有兩段，後段的稱謂，不論是戰前的「高等工業學校、工業專門學校」，還是戰後的「工業專科學校」、「工學院」、「成功大學」，基本上只是學校體制的成長與發展，分別表述不同階段的學校規模與其在整體教育體系中的角色位階。但是，前段的「臺灣總督府」、還是「臺灣省立」、「（中華民國）國立」，才決定了一九九〇年前的校史敘事觀點。換言之，學校歷史的記憶，「學校本身」並非唯一主體，學校的政治隸屬卻決定了歷史記憶的長度，這不只是成天一個學校的特殊問題，我們知道一切戰爭結束前成立的學校，在九〇年代之前，校史的開端是整整齊齊地放在一九四六年。這同時也是戰後臺灣歷史的集體失憶，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的臺灣歷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整整半世紀的歷史，好像憑空消失般地，硬生生從人們腦海中抹去。

正如同九〇年代以後，臺灣社會重新審視自己這島嶼上的歷史，將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半世紀的歷史重新記憶，儘管有著各種不同的敘事觀點之間的爭議，但是「該

去述說這段時期的故事」本身，似乎是難以動搖的基本共識。一個學校的歷史，正如一個人的生命史，應當從它誕生的那一天算起，不論它的身世如何迷離？童年如何坎坷？長輩如何教養？青春如何叛逆？中年如何保守？行路如何曲折？那就是一個學校的一生，悲歡離合，都該被原原本本的紀錄下來。

校慶日的再省思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高等工業學校籌備處開始在總督府文教局內工作，第一任校長若槻道隆和七位教職員開始正式任命。三月十六日至十九日，第一屆入學考試在臺北、臺南兩地進行；三月二十三日發出錄取通知；四月十日，在新建理化實驗室中舉行第一次入學宣誓典禮。

戰前的臺南高工時代，學校的校慶一直是以創校之際的校長、教職員正式任命並執行事務的一月十五日作為校慶（當時稱「開校紀念日」）。學校的主體如果說是教師與學

生的話，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教師開始正式工作；四月十日，學生開始宣誓入學。這兩個日子都適合定格為學校歷史的開端。戰後校慶的選擇標準有二：以升格日（不管是法定日期還是慶典日期）為校慶，當學校改制，校慶就當更易，也許會切割了學校在歷史生命上整體意義。以上級長官巡視日期為校慶，則喪失了學校自身的主體價值。

那麼，成大的校慶應該在哪一天呢？

就老老實實地從學校真正的開始那一天算起吧！

